

语言源头何处觅?

□王士元

哈佛大学的生物学权威 Edward O. Wilson, 今年出版了一本书: *The Social Conquest of Earth*, 书名里的 Social 指的是人类建立在语言上的社交能力。刚出刊的七月号 *Scientific American* 里, 有一篇名为“Why We Help”的文章, 也跟这个课题有关。文章的作者 Martin Nowak 是博弈论的大师。他用电脑模拟研究人在哪些情况下会互助合作, 说明除了竞争之外, 合作的本质也是人类演化过程中一个自然结果。这个思想达尔文很早就讨论过。如果人类祖先没有语言, 不懂得互助合作, 地球上不可能出现今天的文明。

“约定俗成”以造词

十万年前, 当语言刚开始出现时, 人类沟通不过是一种边打手势边出声的简单行为。说话时只使用几个或十几个对生存最关键的原始名词, 如: 果实、水、狮子、鹿等。可是一旦体会到脑子里想的东西可以靠语言跟别人沟通, 词的数目及种类就会倍增, 并且词越多, 沟通越顺利, 词也就增加得更快。除了指具体物件的词之外, 人类也会发明表达动作的词, 如“吃、喝、睡、跑、追”等等, 并会发明越来越抽象的词来表达空间和时间, 如“在水边”和“日出时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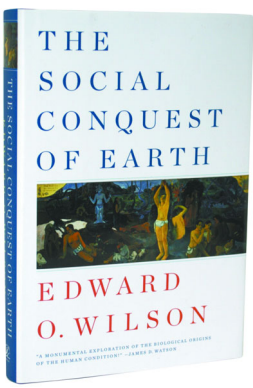
人类最早的词汇具体是如何出现的, 现已无法得知, 但却可以像 Nowak 一样用电脑模拟进行实验。早在战国时代, 荀子就讲过: “名无固宜, 约之以命, 约定俗成谓之宜, 异于约则谓之不宜。”你若用一个我不懂的字, 我可以猜, 猜对了, 你我便多了一个共用的词。这样过不了几代就会有够用的词汇了。十几年

前我跟柯津云在《中国语文》(2001)里讨论过此类实验, 之后也在其他学报里撰文报告过, 如: Complexity 7.341-54, 2002; Complexity 10.650-62, 2005; 《北京大学学报(哲学社会科学版)》43.2.17-22, 2006。还有一篇特别讨论语言跟社交网络的关系, 发表在 *Communications in Computational Physics* 34.935-949, 2008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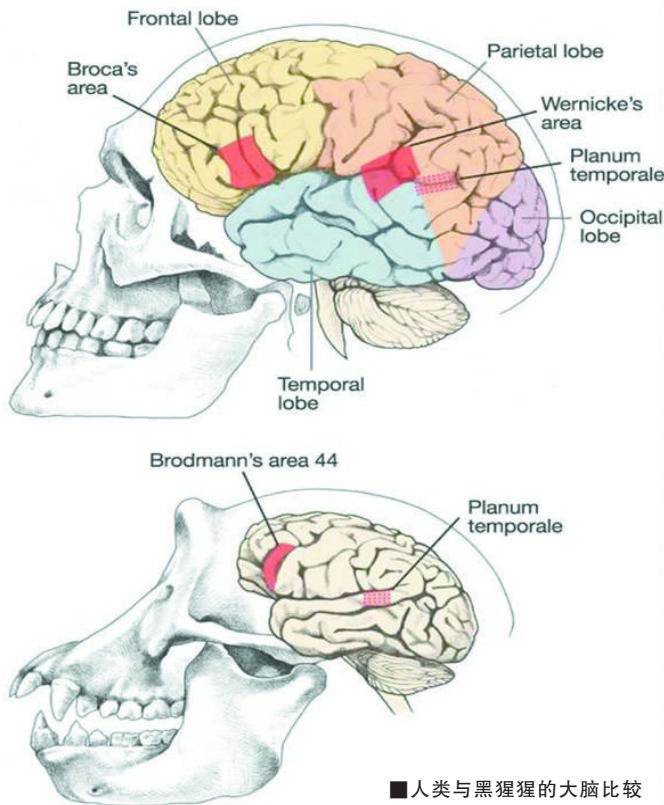
词序的语法意义

古人很早就知道把一些已知的词串在一起用。动物能利用不同的工具来帮它们达到目的。例如黑猩猩会先在桌子上放一把椅子, 然后再爬到椅子上去取从天花板垂下来的香蕉。同样地, 古人把“狮子”跟“在水边”串在一起, 也可以达到沟通的目的。虽然这两个词的次序无关紧要, 但句子里若有两个名词(如“狮子”跟“鹿”)和一个动词(如“追”), 那么词的次序就开始起作用。

这三个词的排列组合, 会有六种可能的次序。可是在上述例子里, 无论哪种次序, 在听者看来, 只有“狮子”是主语, “鹿”是宾语, “追”是动词, 这种理解才可信。如果听到的是“狮子鹿追”, 那么逐渐会形成的句法就是: 主语—宾语—动词, 像日语的句法。如果听到的是“追狮子鹿”, 那么基本句法就是: 动词—主语—宾语, 像南岛语的句法。句法要成为众人共享的惯例, 需要经历种种沟通的误解和失败, 一旦约定俗成, 词的次序就会具备独特的语法意义。汉语的句法是主语—动词—宾语



哈佛大学生物学教授 Edward O. Wilson 的著作 *The Social Conquest of Earth*



人类与黑猩猩的大脑比较

语, 因此当听到“张三追李四”的时候, 人们肯定知道被追的人是“李四”, 而不是“张三”。

很多语言, 除了次序之外, 还可以同时用词缀表达句内几个成分的相互关系。例如日语里, 如果“张三”是追者, 这个词后, 就会加个“か”, 而如果“张三”是被追者, 就会加个“を”。德语、俄语也有很多格的词缀, 汉语和英语语法却不用此类词缀来标示语法功能。

语言变迁无休止

一种语言, 只要有人使用, 就会不断地变迁。上古汉语经过两千年的演化, 分化成现在数百个不同的方言, 语音上的变迁, 如香港粤语里入声字尾的 -p, -t, -k, 在北方话里早已消失; 词汇上的变迁, 如汉语早期用的“犬”, 现在大多用“狗”; 句法上的变迁, 如普通话里的“我给书”, 香港粤语会说“我俾书佢”(我给书他), 两个宾语的次序不一样。如果追溯到更早, 就可以跟与汉语同源的藏语比较。现在藏语里绝大多数的基本语序是主语—宾语—动词。很可能五六千年前, 原始汉语的基本句法也是动词在句尾, 把动词提到宾语之前。这种变迁是汉语跟藏语族分化之后才有的。

“直立行走”奠定语言诞生的前提

人类演化史中, 四百万年前的直立行走是非常重要的进展。先要双腿直立,

手才有机会逐步演化成现在这么灵活, 能做很粗重的活, 如搬麻袋, 也可以做很细巧的工作, 如刺绣。其他灵长类一般用四肢行走, 因此像拿东西、造工具、搏斗等人类用手做的事情, 它们只能用嘴巴来做。黑猩猩是在生物界里离人类最近的动物, 其基因有九成都与人类相同。可是连它们也只能偶尔摇摇晃晃很不稳地走几步路, 与人类相比差得太远。

直立之后, 人类整个身体很多部分都经历了重大改变。不仅与走路有关的骨盆、腿、膝盖和脚发生了变化, 头和脖子从斜向前的角度变得越来越直, 鼻子和嘴巴缩了进去。就语言的出现而言, 最关键的改变是人类的喉咙, 它本来跟口腔几乎呈直线, 现在却垂直地弯了下去。这样的结构就给舌头增加了很多活动空间, 当舌头在口腔后面缩成球形的时候, 舌头前后的口腔跟喉咙就一分为二形成了两条管道, 能发出更多不同的语音。尤其能把语言里最重要的三个元音 [i, a, u], 如“米”、“马”、“母”的音发得很清楚。这样的语音能力是人类所独有的。说话时最关键的器官应该是舌头, 因此在有些语言里, “语言”跟“舌头”来自同一个词。比如, 英语里“语言”是 language, 词根 lang- 就来自拉丁语的 lingua, 意思是“舌头”。英语里的 tongue 这个词, 基本指的是舌头, 也能引申为“语言”的意思。

大脑是语言运用的总指挥

有了灵活的手与舌头, 就需要有结

构, 功能更复杂的大脑来支配、控制, 才能发挥作用。所以大脑在人类的演化中扮演着最中心的角色, 是运用语言的总指挥。虽然在基因上, 人类跟黑猩猩很近, 可是就基因所造出的大脑来说, 我们却跟黑猩猩差得很远。单从体积上看, 黑猩猩的脑容量一般不到 400cc, 而人的脑容量一般都超过 1200cc。但是这个很明显的区别, 却只涉及外部的差异, 更重要的是大脑内部的结构。不过这方面我们知道的很少。

最早用科学方法研究语言与大脑的关系的, 是 19 世纪末叶的法国学者 Paul Broca。他发现如果左大脑前中部受了伤, 那么病人就不能流利地说话。接着又有德国学者 Karl Wernicke 发现, 如果左大脑的后中部受了伤, 病人虽然能够说出话来, 可是他的话经常是一串串毫无语义的音节。19 世纪末又有法国学者 Jules Dejerine 发现, 如果左大脑后面的底层受了伤, 病人虽然眼睛跟视觉都没有问题, 但却丧失了阅读的能力。他能很清楚地看到每个字母的形状, 但不能把这些字母组织起来成为词, 进而理解它们的意思。

这些失语症和失读症病例的发现, 是非常重要的开端, 可是以此做为研究对象却很不方便。一百多年前, 研究者只能等到病人死后做解剖时, 才能看到大脑的状况, 知道哪些部分不正常。可是最后看到的大脑往往也包括了很特别的病症, 无法清楚了解哪些状况引起了哪些病症。我们希望对一个正常人大脑里的语言运作有更多了解, 但因大脑无法直接观察, 只能从一些简单的行为实验作出初步推论。

近几十年来, 情形大有改善。一方面神经科学对大脑的认识更加深入, 自 20 世纪初诺贝尔奖得主 Cajal 发现了神经元, 科学家已经研究出各种不同的神经元的结构, 以及神经元传达信息的生物化学基础; 另一方面由于电子科技的惊人进展, 我们已经能够用电波或磁波经由电脑即时观察正常人大脑里的动静。针对癫痫病患, 20 世纪也出现了新的研究方式, 即在他们大脑不同的地方插入电极, 以探索究竟哪个部分跟语言的哪个功能有关。此类研究, 我在 2011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《语言、演化与大脑》里做过一些初步讨论。

总之, 有了人类的社会演化和大脑演化, 才可能有变化无穷的语言。了解语言的起源与发展, 须从演化论的观点去探究, 这样就势必涉及许多相关学科, 如神经科学、人类学、遗传学、心理学等。只有把这些学科里相关的知识融会贯通, 才有可能真正了解语言的来龙去脉, 这是语言学的最终目标。

(作者系香港中文大学伟伦研究教授、北京大学荣誉教授、“台北中研院”院士)



栏目主持: 侯敏

扫街族

释义: 指较时尚、爱逛街、眼力尖锐、品位独特的街拍爱好者。他们看到马路上好看、好玩、时尚的东西, 就会快速反应, 及时拍下。

语境: 从搭讪照相, 到偷偷跟拍, 扫街族的拍摄方式正悄悄发生变化。(2010 年 5 月 7 日《嘉兴日报》)

淘港族

释义: 指为了节省开支, 专程赴香港购物的内地人。

语境: 随着日常生活产品价格的普遍上涨, 海国族、特搜族、淘港族等新名词闪亮出现, 晒节约、教省钱成为许多论坛上的热门话题。(2010 年 11 月 4 日《新民网》)

森女

释义: “森林系女孩”的简称。指重视自己个性, 崇尚简单自然生活的女性。

语境: 不盲目追随流行, 重视自己的个性, 被认为是“森女”的必备特征, 简约、素雅、悠闲、自由自在更是必不可少的。(2010 年 4 月 20 日《中国青年报》)

微富二代

释义: 指其父母有一定资产, 介于贫富之间的一类人。

语境: 介于贫富之间的有一类“微富二代”, 往往是最令女人们头疼的一类。他们虽然不算财大, 但往往气粗; 有几两小银子, 便总觉得天下女人都冲着他的钱来了; 他们不相信任何女人, 尤其是花过他钱的女人, 无一例外地会被他们打上“拜金女”的商标印记。(2010 年 1 月 22 日《新华网》)

微管

释义: 指从事微博运营管理工作的

人。**语境:** 今年的微管横空出世, 和传统的监控职位有很大不同。除了常规的信息过滤等工作外, 运营专员的业绩考核主要体现在与网友互动方面。(2010 年 10 月 12 日《中国日报网》)

碳捕捉

释义: 指捕捉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, 将其压缩之后, 封存到海底或陆地下面的技术。

语境: 中方愿与美方积极探索清洁能源领域的各种合作, 如新能源、碳捕捉与封存、建筑节能、生物燃料等, 欢迎美国企业来华举办清洁能源示范项目, 集成展示有关技术。(2010 年 5 月 24 日《北京青年报》)

祥云工程

释义: 指旨在 2015 年把北京打造成世界级云计算产业基地的云计算产业发展战略规划。

语境: 根据“祥云工程”计划, 北京将发挥云计算领域技术和产业优势, 合理规划布局云应用、云产品、云服务和云基础设施, 而当务之急是安排部署一批云计算的重大示范应用。(2010 年 7 月 10 日《人民日报》)

橡皮婚姻

释义: 指枯燥无味、缺乏激情和关爱的婚姻状态。

语境: 有调查数据显示, 我国如今有 22% 的婚姻处于类似橡皮婚姻状态。(2010 年 9 月 11 日《新京报》)



德国 学习汉语者为数不多

尽管汉语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, 在德国却只有少数中小学生在学。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, 很多德国家长希望学校能够为孩子提供学习汉语的必修课程。但在 2010—2011 学年中, 德国共有 226 所中小学开设汉语课程, 学汉语的人数仅为 5570 人。2007—2008 学年, 德国只有 3200 名中小学生学习

语。而把英语作为外语学习的德国人有 750 万人, 法语有 170 万人, 意大利语也有约 5.6 万人。有关专家指出, 只有当德国学校像对待英语或西班牙语课程一样对待汉语课程时, 德国才是真正明白来自中国的竞争和挑战。

(杨扬摘自: [中国]《环球时报》, 2011 年 8 月 7 日)

印度 《孔卡尼百科全书》首卷出版

为庆祝孔卡尼语列入宪法第 8 条获得承认, 孔卡尼语言文化基金会于 2011 年 8 月 20 日出版了《孔卡尼百科全书》第 1 卷(共 3 卷)。内容涉及孔卡尼人的语言、历史、地理和文化活动, 以及孔卡尼艺术、文学、节日、传统、风俗和礼仪。印度语言中央研究所的主任 Rajesh Sachdeva 教授发布了这部百科全书并指出,

孔卡尼语与其他 22 种语言一道成为印度宪法第 8 条所认可的语言, 为了孔卡尼语的进步, 应在学校教授这一语言。他提醒每个讲孔卡尼语的人都有责任发展该语言, 保护语言的多样性。

(杨泉棠编译自: [印度]dajjworld.com, 2011 年 8 月 22 日)

韩国 韩语文化中心无法满足中亚“韩迷”需求

由于受到“韩国文化潮流”(简称“韩流”)的影响, 在蒙古、乌兹别克斯坦、哈萨克斯坦等国家, 许多“韩迷”渴望学习韩语, 但由于海外的韩语文化中心缺乏韩国政府支持, 他们得不到学习韩语的机会和途径。据悉, 在蒙古乌兰巴托大学, 每年在 360 名中学生中就有 90 名学生申请到韩语系学习。而现在韩国在海外共有 16 个韩语文化中心。尽管许多中亚国家、非洲国家以及拉丁美洲国家也有许多“韩迷”渴望学习韩语, 但目前中心大部分位于发达国家和地区, 如华盛顿、洛杉矶、悉

尼、伦敦、波兰、西班牙等。
(吴明会编译自: [韩国]韩国时代网, 2011 年 8 月 27 日)



十年磨剑树新知

——评《华语研究录》

□王晓梅

2012 年, 北京华文学院、暨南大学华文学院郭熙教授的《华语研究录》由商务印书馆出版。该书记录了作者十年来在“华语”领域的研究历程, 可以说它是作者以社会语言学的视角考察“华语”、“华语规划理论”、“华文教育”和“华语传播”的结晶。

确立“华语”概念 奠定研究基础

《华语研究录》的核心和论述基础是“华语”概念。这一概念的形成、修正和成熟经历了三个阶段, 从“以普通话为标准的华人共同语”到“以普通话为核心的华人共同语”, 再到“以普通话为基础的华人共同语”, 三个名词的更替体现了作者语言观的转变。“华语”概念的确立, 为之后的相关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全书以《论“华语”》为开篇, 全面梳理了其历时发展和共时变异, 提出一个全新的研究方向, 指出华语研究的性质、意义及主要任务。

“声望规划”是“华语规划”的核心

“华语规划”理念的提出极具开创性, 它以宏观视野(跨国跨境)对单一语种进行语言规划, 强调建立自己的语言观、语言发展观和语言规划观。而这些语言观念的提出, 源自作者深厚的社会学背景和丰富的对外交流经验, 改变了以往“中国核心论”的心态, 开始关



《华语研究录》郭熙著 商务印书馆 2012 年 4 月版

注广大的海外华人社区, 提出了五个“转移”: 从问题到资源的转移, 从管理到服务的转移, 从单一国家或地区到跨国跨境的转移, 从强制到市场的转移及从自发到自觉的语言规划的转移。就具体实践来说, 作者认为“声望规划”是目前的核心工作, 这一洞见是建立在在海外华人社区(主要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)的调查基础上的。在作者提出“华语规划论”之前, “协调”这一概念频频出现, 可以说它是“华语规划论”的雏形或前期思考, 由此可见作者学术思考的演进过程。

华文教学应“当地化”

作者明确“华文教学”的定义, 即“对海外华侨华人的华文教学”, 并且与“汉语教学”区分开来。这一区分充分考虑到海外华人社区的实际情况, 不仅两者的性质、教学对象和教学目标有所不同, 学习群体和语言的认同功能也有差异。作者通过多年的教学及管理经验养成了深刻的洞察力, 尤其是在学科及专业建设方面。暨南大学在中国首先创立了“华文教育专业”, 以培养海外华文师资为目标, 是“华文教学当地化”的重要实践。在一体化与多样性相结合的思想的指导下, 作者提出华文教学要实现当地化, 包括语言要素的当地化、文化内容的当地化、语料的当地化、教学方式的当地化、教学管理的当地化和师资的当地化等。

“华语传播”具体问题亟待解决

“华语传播”是华语规划的内容之一, 这部分讨论以语言传播材料的统计为基础, 描述语言传播现状是第一步, 更多的具体问题亟待解决, 例如各地孔子学院的运作方式等。另外, 该书还有五个附录, 包括四篇海外媒体访问稿以及一篇作者的感性回顾文章。通过这些文字, 读者可以了解到更真实的郭熙, 一位站在华语研究最前线的学者。十年磨一剑, 《华语研究录》“有据有论”, 必定是作者学术生涯中一个重要里程碑。
(作者单位: 马来亚大学)

